

# 土改叙事与土改叙事研究综述

程娟娟

(菏泽学院 文学与传播系, 山东 菏泽 274015)

**摘要:**关于土改叙事文学可按照产生时代的不同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四十年代土改的经典叙事、五六十年代的政治化演绎、八十年代之后的个人书写。有关土改叙事的研究也经历了研究视野由狭隘到开放、研究成果由单一到丰富的漫长曲折道路。目前的土改文学研究在不同声音的碰撞与对话中逐渐趋于深化,不过依然存在一些不足,缺乏整体性的突破。突破既有框架,开拓研究视野,回归历史现场,建构一种严谨的学理范式,会给当下的研究带来新的超越。

**关键词:**土地改革;土改叙事;解放区文学;文学批评;文学史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4)03-0078-09

—

土地改革是中国农村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发生的重大事件之一,1946年的“五四指示”的发布标志着土地政策由温和的减租减息转变为激进的分配地主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次土地改革主要是在北方的晋冀鲁豫、晋绥、晋察冀、山东、华中、东北等各大解放区进行的,由于战争形势的影响,土改政策上有过波动,在摸索中不断进行调整。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指引下,解放区作家开始投身到这场伟大的历史运动中去,以虔诚而积极的姿态记录下这一时代的巨大变迁,反映农村中进行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农民翻身后的喜悦,以无可置疑的态度来论述土改的政治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根据周扬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在入选《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作品中写土地改革及其他反封建斗争的,有41篇<sup>①</sup>。当然,还有大量未被入选的作品。

从文学体裁上看,为了实现配合土地改革宣传的任务,作家们围绕着土地改革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小说、戏剧,还有快板、评书、歌谣、鼓词、说唱等通俗文学艺术作品。其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广大翻身的人民群众也参与到文学活动中来,出现了大量的翻身戏和翻身诗歌,边区提出了沿着《穷人乐》的方向发展群众文艺运动,农村中出现大量剧团,诸多戏剧如《血泪仇》、《穷人恨》、《反“翻把”斗争》、《照减不误》等都在土改斗争中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动员作用,促进了群众思想的转变,有力地推动了土改的深入开展。荒煤在《关于农村文艺运动》中指出“今天边区农村文艺运动中还是以戏剧最为活跃,普遍,成绩最大。特别经过一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更是飞跃发展,无论在数量与质量上都前进了一大步”<sup>[1]</sup>。

**收稿日期:**2014-01-02

**基金项目:**菏泽学院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二十世纪土改文学叙事研究”(XY13BS08)

**作者简介:**程娟娟(1982-),女,山东肥城人,讲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sup>①</sup>这41篇作品中包括了反对封建迷信、文盲、不卫生、婚姻不自由等题材的作品,纯粹反映土地改革的作品大约有15篇,包括戏剧:马健翎的《血泪仇》、《穷人恨》,贾霁和李夏执笔的《过关》;小说: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王希坚的《地覆天翻记》,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王力等的《晴天》,俞林等的《老赵下乡》;诗歌: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田间的《赶车传》,萧三、艾青、王希坚等的《佃户林》,阮章竞、张志民等的《圈套》,工农兵群众创作的《东方红》。

农民诗人则以形象生动的语言、简单朴素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翻身后感激与兴奋的心声。很多报纸也开辟专栏,刊载关于土地改革的文学作品。丁玲、周立波、赵树理、孙犁等知名作家响应号召,作为工作队成员亲自到农村参加土改斗争,感受到农村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和农民在运动中的思想感情所发生的重大转变。这是作家真正接触到的现实斗争,给他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促使他们拿起笔来描绘土改的历史画卷。他们创作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邪不压正》、《村歌》等作品都有深厚的现实生活基础和明确的为政治服务的创作宗旨,是解放区反映土改运动的经典之作。

建国之后,土地改革从北方老区扩展到了广大的新解放区,包括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各大行政区,涉及约 3.1 亿人口,规模巨大,情况复杂。作为思想改造的重要方式,广大知识分子积极参加了新区土改,将现实的土改斗争与思想改造结合起来,从而掀起了第二轮的创作高潮。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反映土改的作品,呈现出多姿多彩的丰富面貌。主要包括陈学昭的《土地》(1953 年,江南土改),陆地的《美丽的南方》(1960 年,广西土改),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1961—1963 年,四川彝族土改),王西彦的《春回地暖》(1963 年,湘东土改),梁斌的《翻身记事》(1978 年,华北土改),陈残云的《山谷风烟》(1979 年,广东土改),王希坚的《雨过天晴》(1978 年,山东土改)等。这些作品具有非常鲜明的地域特色,表达的侧重点略有不同,如梁斌重点突出阶级斗争,陆地关注知识分子的改造,李乔侧重民族特色。不过创作目的和身份意识的共性使得作品呈现出某种类型化的特征。

由于土改文学的创作与外在环境的密切关联,在作品中可以看出土改政策的变动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同时反映老区土改与新区土改的作品由于产生时代的不同、政策的变动,在创作风貌上也呈现出姚黄魏紫的不同特色。20 世纪 40 年代的土改作品风格上昂扬明快,情感丰富,富有感染力,20 世纪 50 年代的作品则较为凝重,笔调沉闷,情节出现模式化的倾向。

土地改革完成不久,自 1953 年又迅速掀起了合作化运动的高潮,于是众多作家纷纷投身于这一新的浪潮中去,再谈土改已经变得不合时宜。受到冷落的土改题材再次成为作家的关注对象,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的事情了。新时期以来开放的文化语境为年轻作家们重新审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提供了可能,他们对于原有小说的强烈政治化叙事非常不满,着力淡化历史的政治痕迹,力图颠覆以往革命传统历史小说的模式化书写,展示鲜明的个人化的创作立场。这一时期出现的涉及土改的作品包括乔良的《灵旗》(1986 年),张炜的《古船》(1986 年),尤凤伟的《诺言》(1988 年)、《合欢》(1993 年)、《小灯》(2003 年)、《一九四八》(2008 年),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1991 年),苏童的《枫杨树故事》(1991 年),池莉的《预谋杀入》(1991 年),柳建伟的《苍茫冬日》(1994 年),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1996 年),洪峰的《模糊年代》(2001 年)等。

而在港台地区出现的描写土改的作品主要有张爱玲的《秧歌》(1954 年)、《赤地之恋》(1954 年),陈纪滢的《荻村传》(1955 年),姜贵的《旋风》(1957 年),寒山碧的《还乡》(2001 年)。

## 二

土改文学是和土改的现实发展密切相关的,为了推进土改的深入开展,迅速转变农民的传统价值观念,上级领导鼓励关于土改的文学创作。由于处于战争年代,土改政策又一度发生变化,早期的创作并不多,主要是一些短篇小说、翻身戏和翻身诗歌,并没有引起批评界的关注。直到 1949 年左右,丁玲、周立波、赵树理的土改作品纷纷问世,开始出现了比较重要的评论文章,在认同作品政治上的重要意义的同时也对作品提出了相对中肯的批评意见。

陈涌的《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肯定了作品的思想意义、在反映农村阶级斗争复杂性和人物内心世界的优点,也指出作品语言运用的局限和对于中农政策认识的不足<sup>[2]</sup>。冯雪峰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高度评价了作品在文学史的重大意义,“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最初的比较显著的一个胜利”<sup>[3]</sup>。

蔡天心的《从〈暴风骤雨〉里看东北农村新人物底成长》认为作品优点在于塑造了生动的人物形象,描写了新的英雄人物的成长。不过由于回避了土改中的重要问题,减弱了作品的现实意义<sup>[4]</sup>。陈涌的《暴风骤雨》首先肯定了这是一部思想与生活相结合的成功之作,具有深刻的示范意义,特别是作者对于新生活与新人物的热情,同时也指出人物形象过于单纯、过多使用方言等方面的不足<sup>[5]</sup>。总的来说,这两篇小说因获斯大林文学奖受到领导和学界的高度关注和一致肯定,赞颂远远多于批评,确立了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而赵树理的《邪不压正》则引起了较多的争议。在《人民日报》上有6篇批评文章,分为指责和维护两种对立的观点,其中党自强的《〈邪不压正〉读后感》批评作品忽视了党的领导作用,人物性格过于软弱<sup>[6]</sup>,耿西的《漫谈〈邪不压正〉》肯定了作品的价值,认为这是文艺战线的新起点<sup>[7]</sup>。稍后竹可羽的《评〈邪不压正〉和〈传家宝〉》指出作品的人物没有积极的斗争,不能给读者教育意义<sup>[8]</sup>,在《再谈谈关于〈邪不压正〉》进一步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高度批评了人物塑造的缺陷<sup>[9]</sup>。关于马加的《江山村十日》的评论文章比较简短,只是以读后感的方式较为浮泛地肯定作品的思想意义,没有深入的分析<sup>[10]</sup>。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批评者多是从政策角度来考量小说的政治宣传作用,强调的是阶级斗争和英雄人物的塑造,不太关注小说的艺术审美层面。主流之外的作品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孙犁的《十年一别同口镇》被《冀中导报》批评为“客里空”<sup>[10]</sup>,《村歌》也被指责没有突出党的领导作用和人物的塑造流露出小资产阶级情调<sup>[11]</sup>。由于批评者的视角单一,这些评论或是大而无当,内容空泛,或是有感而发,触及表面,研究始终停留在为政治服务的层面,尚不够深入细致。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新区土改的进行,出现了新一轮土改写作的高潮,这时评论界关注的是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合作化的小说,土改文学不再受到评论者的青睐,只有一些较为零散的对作品的批评。不过对作品的思想意义层面要求更高,既要完整正确地体现党的政策,又要以农民的血泪史对新一代青年进行革命思想教育,一些作品因不符合政治标准的要求而受到批评。在《讨论〈美丽的南方〉来稿综述》中提到对于贫农韦廷忠形象的塑造,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种对立意见。一种认为韦的转变是真实可信的,具有典型意义;另一种认为韦作为深受阶级压迫的贫农,他革命的一面即反抗性没有体现出来。对于领导者杜为人的塑造同样也有分歧,一种意见认为作者通过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刻画人物形象,真实可信;另一种则指出杜对爱情的暧昧和怕打针的软弱,是有损于人物的高大形象的。《春回地暖》受到了粗暴的指责,被指为反革命复辟开路,作家本人也受到严重的冲击。彝族作家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由于正确地表现了党的民族政策受到赞许,没有塑造成功的汉族人物形象则成为作品的缺陷。沈澄在《三走严庄》中肯定了作者选取几个代表性的场面成功刻画出人物性格的成长的艺术手法<sup>[2]</sup>。

而早先被奉为土改经典作品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此时也受到了批评,“它没有写出农民的强烈的土地要求,它没有写出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仇恨,没有写出一个比较成功的新的农民的形象,没有写出土改斗争中党的领导形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致命的缺点”。随着1958年丁玲被打为反革命集团成员,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用语也越来越严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被认为是具有重大问题的反党小说,作者是用资产阶级的眼光来对待土改,蓄意丑化人民群众<sup>[12-13]</sup>。

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文学批评更加强调社会主义现实原则,要求在作品中反映出历史的本质和人民的反抗精神,用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形象和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来激励后来的革命接班人,评论

①可参见冯雪峰的《马加的〈江山村十日〉》,《小说月刊》第3卷第6期,1950年3月;沈起予的《读〈江山村十日〉》,上海《小说月刊》第2卷第3期,1949年12月;许杰的《〈江山村十日〉笔谈》,上海《小说月刊》第3卷第6期,1950年3月;杨朔的《〈江山村十日〉读后感》,《文艺报》第1卷第2期,1949年12月。

②相关文章有《讨论〈美丽的南方〉来稿综述》,《广西文艺》1962年4月号。唐克新(署名)的《为反革命复辟开路的〈春回地暖〉》,《收获》1966年第3期。冯牧的《谈〈欢笑的金沙江〉》,《文艺报》1959年第2期。沈澄的《三走严庄》,《文艺报》1961年第1期。

者关注的不是情节生动与否,而是是否凸显了激烈的阶级斗争;重视的不是人物真实与否,而是是否体现了阶级的属性。群众在面对社会变动时的从犹豫不安到积极主动的转变过程本来是十分正常的,这些都被评论者以阶级的先入之见加以否定。政治标准是评论者的首要原则,甚至有研究者上纲上线,乱扣帽子,缺乏学术研究应有的理性和客观。这些文学评价的标准自然也会进一步干预作家新的创作,被作者内化为创作的注意原则,二者互相影响,逐渐形成了土改历史的合法性的一致性认同,也导致了文学在政治的压力下逐渐丧失自身的活力。

“文革”结束之后,评论界又回归到十七年的文学标准进行评价,文学研究方式方法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梁斌的《翻身记事》和陈残云的《山谷风烟》是20世纪70年代末出版的,此时的评价仍然是看重政治意义和思想意义,正确地再现了阶级斗争的尖锐复杂性,“这是一部小说,但更可以说是一幅历史的画卷,一部中国农民深沉悲愤的血泪史,也是一首中国农民翻身解放的叙事诗”<sup>①</sup>。虽然作者和论者都在批判“文革”的“三突出”原则,作品中的主人公形象的塑造还是没有摆脱旧有原则的窠臼。与此同时,对其他作品的评价经历了从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的循环,研究转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当初的原点。

20世纪80年代初,评论界的注意力集中在资料的发掘和整理上,出版了大量的文集、年谱、传记、回忆录、研究资料等,由于缺乏新的研究视野和方法,对于小说文本的分析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刘锡诚的《谈〈暴风骤雨〉及其评价问题》是对小说进行“拨乱反正”的重评之作,对于“四人帮”污蔑该小说是“拼命宣扬布哈林的富农路线”的“反动小说”进行了有力的反驳,重新肯定了小说在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sup>[4]</sup>。赵园的《也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高度评价了丁玲面对现实独立思考的勇气,写出了真实的生活,突破了政治的框架,同时也肯定了文采、黑妮的形象塑造<sup>[5]</sup>。董大中的《重新认识〈邪不压正〉》认为小说具有极大的真实性和强烈的思想教育意义,肯定了艺术上的民俗特色,存在缺点的根本原因在于作者理论修养的欠缺<sup>[6]</sup>。董文没有对赵树理创作“每况愈下”的现象进行深层的原因探析,其结论又回到了之前的研究定论。针对批评界认为《铁木前传》的主题是“反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的共识,邱胜威在《悲歌友情的失落 渴求人性的复归——〈铁木前传〉主题新探》中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认为小说是关于友情与人性的主题,孙犁敏锐地发现了土改后的人的“异化”现象,希望促进人性的觉醒和复归<sup>[7]</sup>。邱文不拘于权威的定论,对于主题解读进行了新的探索,尽管不够深入,在当时还是难能可贵的。

文学批评急于重新评价作品,又囿于传统思维的定式裹足不前,找不到突破点,这种现象由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的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输入而得到了改观。1988年掀起了一股“重写文学史”的热潮,对原先的政治式写作模式进行了质疑和反思,要以新的方法对文学史进行重新评价。王雪瑛的《论丁玲的小说创作》指出丁玲早期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自我的大胆投射与贯注,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一部概念化的失败之作,已经完全丧失了作家的独特个性<sup>[8]</sup>。她的结论与一年前严家炎在《开拓者艰难跋涉——论丁玲小说的历史贡献》<sup>[9]</sup>中强调丁玲作为文学“开拓者”的突出贡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两篇观点针锋相对的文章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进一步推动了研究的发展。此外,还有对赵树理的再评价,戴光中的《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从“问题小说论”和“民间文学正统论”两个方面对赵的创作进行了反思,认为这是一股“逆流”,导致文学发展进入了死胡同<sup>[20]</sup>。唐再兴在《文学史不能这样“重写”——评戴光中的〈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对戴文短短一年思想的突变进行了有力的反驳,认为现在仍有提倡“赵树理方向”的必要<sup>[21]</sup>。文学批评终于打破了传统的庸俗社会学批评的束缚,对于权威性结论提出了大胆的质疑,开始关注文学自身的审美价值,其出发点是反思文学史,某些结论却只是简单地否定作家的成就,批评者的思维方式还是二元对立的,对于文学生存的具体历史语

<sup>①</sup>参见张铮、关振东:《别具一格的历史画卷——读陈残云同志的〈山谷风烟〉》,载于《作品》1980年第2期。关于《翻身记事》的评论文章主要有刘振声:《铁骨铮铮记翻身——〈翻身记事〉漫评》,河北文联编《文学评论集》1982年1月;王昌定:《于朴素处见功力——读梁斌的长篇文章〈翻身记事〉》,载于《天津日报》1982年6月14日。

境没有认真的探讨。不过,不同见解的论争毕竟为进一步研究的开展开拓了新的空间。此时多是宏大论述,批评家尚没有注意到具体文本的解读<sup>①</sup>。

20世纪90年代学界掀起了“再解读”的风潮,刘再复、林岗的《中国现代小说的政治式写作——从〈春蚕〉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于土改文学中的暴力叙述时作家的无动于衷给予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这是人性彻底消失的“冷文学”,缺乏文学价值<sup>[21]</sup>。唐小兵的《暴力的辩证法——重读〈暴风骤雨〉》揭示了语言形态上作品对农民语言的剥夺利用,起主导作用的是体制化语言,象征层面上暴力的语言需要借助于身体的隐喻再现,试图发掘出文本背后的权力关系和运作机制<sup>[22]</sup>。刘文的人文关怀、唐文的意识形态反思,引发了学者对传统的红色经典的再认识,研究向更深的范围拓展延伸,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包括李杨的《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黄子平的《“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李杨的《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蓝爱国的《解构十七年》(华东师大出版社,2003年)、郭冰茹的《十七年(1949—1966)小说的叙事张力》(岳麓书社,2007年)、李遇春的《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阎浩岗的《“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人民出版社,2009年)等,这些专著不是专门探讨土改文学的,但对于某些重要作品有所涉及,对于土改文学研究视野和理论方法的拓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土改文学研究非常明显地突出了多元化的特点,研究方法不断革新,视野更加开阔,出现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综合研究。关于土改文学的全面性综合研究并不算多,有两篇非常重要的论文。一篇是贺仲明的《重与轻:历史的两面——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土改题材小说》,分析了土改文学的两代作家在创作态度、历史观念和艺术形式上存在的巨大差异,并试图通过时代语境揭示出原因所在<sup>[24]</sup>。贺文对于解析两种文本的特点鞭辟入里,重的宏大与偏执、轻的灵动与浮躁分析得十分透彻,原因透视和所得结论也较为令人信服。只是限于篇幅,一些问题没有深入展开。张全之、刘媛媛的《中国两类土改小说的比较研究》则进一步从暴力与人性、工作组与贫雇农会的角度对两个时代的土改作品进行了分析<sup>[25]</sup>。二者的深层关联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还有一篇是陈思和的《土改中的小说与小说中的土改——六十年文学话土改》,这篇长文视野广阔,气势恢宏,严谨细致,对60年来的土改小说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指出当代文学史没有土改杰作的原因除了遇到政策上的问题不容易把握之外,深层的原因在于遇到了怎样书写暴力的问题<sup>[26]</sup>。陈文还以《古船》为例解析了作者如何从人性角度反思土改中的暴力,并对暴力的产生作了心理学的解释,土改文学的价值就在于保留了真实的民间社会历史材料。陈文对于土改暴力叙事的思索深刻独到,非常有见地,是近年来有分量的一篇综合考察的力作,不过陈文在谈到20世纪40年代小说暴力的三种方式时,认为赵树理完全不涉及暴力土改,实际上《邪不压正》在人物对话中曾提到过本村斗地主的事情,丁玲也不是简单地将暴力喜剧化,钱文贵的出丑是打消其权势的一种策略,这些细节值得探讨。

(2)比较研究。通过相关文本的比较分析,更容易发现事物的本质特性,新时期的比较研究视野丰富,包括历时层面和共时层面,进一步拓宽了研究的思路。共时层面上,主要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比较,在期刊网上搜索大约有14篇相关论文,多是从主题、人物、语言、结构等方面进行比较。历时层面上,一是将同一作家的作品进行比较,透过文本的变迁来考察内在变化的轨迹。王进庄在《周立波:乡村叙事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以〈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为例》指出《暴风骤雨》呈现出作家和民族国家想象的一致,《山乡巨变》显示出了二者出现的裂隙<sup>[27]</sup>。刘海军、吴浪平在《从激进归趋温和——论周立波〈暴风骤雨〉、〈山乡巨变〉革命姿态的变迁》分析了作者的革命姿态由激进到保守

①相关的争论文章还有郑波光:《接受美学与“赵树理方向”——赵树理艺术迁就的悲剧》,载于《文学评论》1988年第5期;罗守让:《文学史能这样重写吗?——也谈对赵树理的再认识》,《文艺报》,1990年5月26日。

的转变原因与意义<sup>[28]</sup>。二是对不同时空的土改作品进行比较,张谦芬在《从互文性评张爱玲与丁玲的土改书写》中分析了二人作品中叙事结构、人物关系、暴力描写、叙述立场的不同,张爱玲对丁玲作品某些生活细节的借用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形成了新的思考生长点<sup>[29]</sup>。该文观点新颖,论述比较全面。肖菊蘋在《〈赤地之恋〉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借鉴》中详细比较了《赤地之恋》在人物语言、干部腐化、农民洗手动作等细节上多处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雷同<sup>[30]</sup>。黄勇在《土改的两张面孔——〈暴风骤雨〉、〈故乡天下黄花〉叙事比较》中从土改的程序及背离、人物关系与设置、相应细节比对等方面对两个具有标本价值的文本进行了比较分析<sup>[31]</sup>。

(3)文本解读。一方面是重新发现有价值的小说文本,郭战涛的《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罕见的地主形象——秦兆阳小说〈改造〉细读》<sup>[32]</sup>、张谦芬的《沈从文建国初期的土改书写》关注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受到批判或冷落的土改书写<sup>[33]</sup>,对于研究范围的进一步扩展颇具启发意义。另一方面是用新的方法对经典文本进行解读,秦林芳的《“宏大叙事”中的细节瑕疵——〈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侯殿魁描写”献疑》<sup>[34]</sup>、黄曙光的《名家与败笔——重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通过文本细读发现了小说文本的人物描写细节、标题与内容的不符的问题<sup>[35]</sup>。运用叙事学方法解读文本的文章相对较少,李卫华的《试析〈邪不压正〉的叙事时间》从时序、时距、频率三个方面分析了文本具有传统小说与现代技巧杂糅的特点<sup>[36]</sup>。白春香的《赵树理小说的故事体叙事——以〈邪不压正〉为例》分析了赵树理故事体叙事的特征和存在的缺陷<sup>[37]</sup>。

女性批评方法的引入也为研究增添了新的视野,苏奎在《土改叙事中的女性形象研究》中肯定了妇女翻身解放的意义及时代限度,指出女人男性化是常见的叙事手法,命名与入党表达了女性翻身的彻底性<sup>[38]</sup>。该文对于土改文学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不过将《三走严庄》(1962年)、《山村的早晨》(1957年)、《春回地暖》(1963年)归入新时期土改叙事似乎有所不妥。常彬在《延安时期丁玲女性立场的坚持与放弃》中指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丁玲放弃了女性立场,对于“政治化”了的“坏”女人进行无情的鞭挞<sup>[39]</sup>。常文意在梳理丁玲在延安时期女性意识由坚守到放弃的变化轨迹,没有对文本进行仔细的分析,而文本中实际上还留有作家性别思考的痕迹。

(4)现代性视角。刘云在《土改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生成——重读〈暴风骤雨〉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从民族国家生成的意义上指出,这种“政治式写作”的“革命文学”是一种现代性要求下的必然产物<sup>[40]</sup>。该文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对于研究的深入具有启发意义。秦林芳在《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国民性批判》中认为作者对农民精神痼疾的批判表现了启蒙的诉求,文本中存在着革命与启蒙话语的并存<sup>[41]</sup>。他在《在“传达意识形态的说教”之外——〈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人文精神》中认为作者的人文关怀已经突破了“意识形态预设”,革命意识与人文精神的并存使作品具有丰富性和审美性<sup>[42]</sup>。阎浩岗在《“土改”叙事中的道义问题——就〈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的评价与刘再复等先生商榷》中从文学角度出发认为作为“除霸复仇”的故事,受到压迫的农民具有报复的行为可以理解,对于单纯地从人性角度对小说予以否定的思路提出了质疑<sup>[43]</sup>。农民的报复行为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种狂热激愤、毫无理性的暴力行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接受值得进一步探讨。

(5)社会学、人类学等成果的借鉴。关于土改的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已取得较为深入的成果,对这些研究的适度借鉴可以有效地开拓研究的视野。万直纯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农村宗法社会》从宗法视角来观照作品,认为阶级关系的复杂性正是宗法关系网络的存在造成的,土改的过程即是打破这个关系网络,消除农民的宗法观念,从而改造了乡村社会的形态结构<sup>[44]</sup>。袁红涛的《“一部关于中国变化的小说”——重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从宗法社会与民族国家的冲突关系来解读作品,在历史大转折的时代,作品结构处于“旧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过渡转换的形态,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作品评价的变化,小说的意义在于是一部“新中国”的叙事<sup>[45]</sup>。这两篇文

章的切入角度新颖独特,对过去的研究命题能够提供新的较为合理的解释。苏奎的《反动分子·流氓无赖·心灵变异者——土改文学中的坏分子形象流变》则借助历史资料分析了坏分子在土改真实与小说描述中的不同,揭示出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与新时期的文本中人物塑造的差异性<sup>[46]</sup>。余晓明的《土改小说:意识形态与形式》则借鉴的是人类学的仪式理论,解读文本是如何进行意识形态再生产的,群众大会作为社会空间的建构仪式,是革命意识形态的介入、强化、确立的过程<sup>[47]</sup>。总的来说,研究对于跨学科成果的借鉴还是相对较少的,在将来也许会成为新的学术生长点。

(6)相关史料、版本研究。龚明德的《不见于报刊的一次论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问世前后》<sup>[48]</sup>、严家炎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丁玲的创作个性》<sup>[49]</sup>均披露了关于小说创作和出版的某些不为人知的史料,有利于研究的深化。相关的版本研究主要有龚明德的论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版本变迁》<sup>[50]</sup>,专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sup>[51]</sup>以及金宏宇的论文《名著的版本批评——〈桑干河上〉的修改与解读差异》<sup>[52]</sup>、专著《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sup>[53]</sup>(第七章《桑干河上》)。龚明德梳理了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有筌路蓝缕之功,金宏宇将研究进一步深化,分析了版本变迁对于结构、主题、人物产生的重要影响,在版本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对于《暴风骤雨》的版本变迁则相对冷落,胡光凡的《从手稿和版本看周立波对〈暴风骤雨〉的修改》<sup>[54]</sup>和余丹清的博士论文《周立波新探》<sup>[55]</sup>有所涉及,但胡文论述较为概括,余文关注的是标题、序跋、插图、封面等副文本,都没有较为系统地梳理版本的变化。拙文《〈暴风骤雨〉的版本变迁研究》分析了这部土改文学经典的版本变迁历程,除了语言文字的润色外,更重要的是对内容的洁化处理<sup>[56]</sup>。此外,张均先生的《小说〈暴风骤雨〉的史实考释》<sup>[57]</sup>、《区分的辩证法——〈暴风骤雨〉人物本事研究》<sup>[58]</sup>则在史料搜集的基础之上,对于历史原型与文本描述的差异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将史料有效运用起来,而不只是单纯地搜集资料,这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有关史料、版本的研究还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 三

通过以上对于土改叙事及土改叙事研究的简单梳理,可以发现关于土改文学的研究虽然已经出现了不少的成果,在研究方法和视角上都有所创新,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相对薄弱的环节需要丰富和提高。综合以上研究现状的分析,今后的研究将会朝着更加丰富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视角更为开阔,思想更加活跃。

(1)对于土改文学的文本研究虽然出现了不少的成果,但主要集中于早期的经典作品,如《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而之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土改小说的产生显然有些不合时宜,在如火如荼的合作化运动中,这些作品被淹没在同时代的合作化题材作品中。这些作品还处于相对受冷落的境遇,今后将会成为研究的热点。

(2)在研究的文体上,目前学界主要关注的是小说。而在20世纪40年代,为了实现配合土地改革宣传的任务,作家们围绕着土地改革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戏剧,还有快板、评书、歌谣、鼓词、说唱等通俗文学艺术作品。同时,广大翻身的人民群众也参与到文学活动中来,出现了大量的翻身戏和翻身诗歌,加强不同体裁的土改作品研究将会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趋向。

(3)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将会更多出现进行跨学科的开放式、整合性比较研究。如土改之后紧接着是农村合作化运动,20世纪80年代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可以进行纵向的比较。大陆与港台地区反映土改的作品,中国与同时期的苏联文学、朝鲜文学等也可进行横向的比较。这样通过两个或多个研究对象的参照、质疑、碰撞、渗透,其特色在对比中得到进一步的彰显和发展,可以获得对于土改文学的全新阐释和理解。

(4)当下研究中,只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的史料搜集及版本变迁研究较为深入,今后对于其他作品的史料及版本的研究将会逐步拓展,相信史料的发掘将会进一步推动研究的深入。

(5)土改文学是解放区文学的代表作,同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规范的建立起着重要作用。目前尽管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有的研究还较为粗疏、不够精细,还缺乏对于土改文学整体性的研究,对于土改文学之于文学史的意义没有进行认真的梳理。

总之,研究土改文学时避免高谈理论而脱离文本,将作品还原到历史语境,透视作品的沉默和空白、含混与矛盾,重新发现文本的意义。土改叙事研究期待着在现有的批评模式上有所突破,出现新的研究话语和更丰富的研究成果。

#### 参考文献:

- [1]荒 煤.关于农村文艺运动[C]//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五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130.
- [2]陈 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J].人民文学,1950(9):36-42.
- [3]冯雪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N].文艺报,1952-05-25(10).
- [4]蔡天心.从《暴风骤雨》里看东北农村新人物底成长[J].东北文艺,1950(2).
- [5]陈 涌.暴风骤雨[N].文艺报,1952-06-25.
- [6]党自强.《邪不压正》读后感[N].人民日报,1948-12-21.
- [7]耿 西.漫谈《邪不压正》[N].人民日报,1949-01-16.
- [8]竹可羽.评《邪不压正》和《传家宝》[N].人民日报,1950-01-15.
- [9]竹可羽.再谈谈关于《邪不压正》[N].人民日报,1950-02-25.
- [10]刘 敏.孙犁同志在写作上犯“客里空”错误的具体事实[N].冀中导报,1948-01-10.
- [11]王文英.对孙犁的《村歌》的几点意见[N].光明日报,1951-10-06.
- [12]竹可羽.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J].人民文学,1957(10).
- [13]王燎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究竟是什么样的作品[J].文学评论,1959(1):67-83.
- [14]刘锡诚.谈《暴风骤雨》及其评价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1979(4):313-317.
- [15]赵 园.也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C]//丁玲作品评论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4.
- [16]董大中.重新认识《邪不压正》[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3):138-150.
- [17]邱胜威.悲歌友情的失落 渴求人性的复归——《铁木前传》主题新探[C]//刘金镛,房福贤.孙犁研究专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 [18]王雪琪.论丁玲的小说创作[J].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88(12):222-243.
- [19]严家炎.开拓者艰难跋涉——论丁玲小说的历史贡献[J].文学评论,1987(4):81-94.
- [20]戴光中.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J].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88(12):244-256.
- [21]唐再兴.文学史不能这样“重写”——评戴光中的《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J].文艺理论与批评,1989(2):38-45.
- [22]刘再复,林 岗.中国现代小说的政治式写作——从《春蚕》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C]//唐小兵.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增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23]唐小兵.暴力的辩证法——重读《暴风骤雨》[C]//唐小兵.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增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24]贺仲明.重与轻:历史的两面——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土改题材小说[J].文学评论,2004(6):153-160
- [25]张全之,刘媛媛.中国两类土改小说的比较研究[J].文史哲,2012(2):130-139.
- [26]陈思和.土改中的小说与小说中的土改——六十年文学话土改[J].南京大学学报,2010(4):76-93.
- [27]王进庄.周立波:乡村叙事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以《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为例[J].名作欣赏,2007(2):77-80.
- [28]刘海军,吴浪平.从激进归趋温和——论周立波《暴风骤雨》、《山乡巨变》革命姿态的变迁[J].船山学刊,2008(1):146-148.
- [29]张谦芬.从互文性评张爱玲与丁玲的土改书写[J].理论与创作,2006(1):100-105.
- [30]肖菊蘋.《赤地之恋》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借鉴[J].长城,2009(5):37-38.
- [31]黄 勇.土改的两张面孔——《暴风骤雨》、《故乡天下黄花》叙事比较[J].小说评论,2006(1):81-95.

- [32]郭战涛.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罕见的地主形象——秦兆阳小说《改造》细读[J].当代作家评论,2008(2):144-149.
- [33]张谦芬.沈从文建国初期的土改书写[C]//胡星亮.中国现代文学论丛:第三卷,第一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34]秦林芳.“宏大叙事”中的细节瑕疵——《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侯殿魁描写”献疑[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5):177-183.
- [35]黄曙光.名家与败笔——重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J].名作欣赏,2009(5):55-57.
- [36]李卫华.试析《邪不压正》的叙事时间[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2):124-128.
- [37]白春香.赵树理小说的故事体叙事——以《邪不压正》为例[J].晋中学院学报,2008(4):10-15.
- [38]苏奎.土改叙事中的女性形象研究[J].文艺争鸣,2009(10):85-90.
- [39]常彬.延安时期丁玲女性立场的坚持与放弃[J].文学评论,2005(5):86-94.
- [40]刘云.土改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生成——重读《暴风骤雨》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J].小说评论,2008(6):62-67.
- [41]秦林芳.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国民性批判[J].齐鲁学刊,2009(4):130-135.
- [42]秦林芳.在“传达意识形态的说教”之外——《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人文精神[J].文学评论,2010(1):163-169.
- [43]阎浩岗.“土改”叙事中的道义问题——就《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的评价与刘再复等先生商榷[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6):1-7.
- [44]万直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农村宗法社会[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3):245-262.
- [45]袁红涛.“一部关于中国变化的小说”——重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2):154-164.
- [46]苏奎.反动分子·流氓无赖·心灵变异者——土改文学中的坏分子形象流变[J].文艺争鸣,2014(1):89-99.
- [47]余晓明.土改小说:意识形态与形式[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6(2):64-68.
- [48]龚明德.不见于报刊的一次论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问世前后[J].长城,2000(4):130-136.
- [49]严家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丁玲的创作个性[J].北京大学学报,2008(2):85-88.
- [50]龚明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版本变迁[J].新文学史料,1991(1):120-124.
- [51]龚明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 [52]金宏宇.名著的版本批评——《桑干河上》的修改与解读差异[J].武汉大学学报,2004(1):58-63.
- [53]金宏宇.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 [54]胡光凡.从手稿和版本看周立波对《暴风骤雨》的修改[J].社会科学战线,1987(4):277-280.
- [55]余丹青.周立波新探[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7.
- [56]程娟娟.《暴风骤雨》的版本变迁研究[J].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十辑),2012(2):93-100.
- [57]张均.小说《暴风骤雨》的史实考释[J].文学评论,2012(5):143-150.
- [58]张均.区分的辩证法——《暴风骤雨》人物本事研究[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139-146.

## Review of Land Reform Narrative and Land Reform Narrative Research

Cheng Juanjuan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 Heze University, Heze 274015,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imes, narrative literature on land reform can produce in three stages: classical narrative of the land reform in Forties, political interpretation in Fifties and Sixties, personal writing after Eighties. Research on land reform narrative also experienced the narrow field of vision to open research, findings from a single to a wealth of long and winding road. The current land reform researches tended to deepen the study in different voices collide with dialogue,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deficiencies, lack of integrity breakthrough. Breakthrough existing framework, pioneering research horizons, return to the historical site, construct a rigorous theoretical paradigm, the current study will bring new beyond.

**Key words:** land reform; land reform narration; liberated literature; literary criticism; literary history

(责任编辑 王作)